资料图

曾国藩守拙与胡适藏晖

羽 戈

近世英杰，大多天资卓越。像徐世昌这样“并不十分聪慧”，都要被史家拎出来，以示惋惜（其实徐世昌相当聪慧，只是不够十分，足见史家悬鹄之高）。以笨著称的名人，实属罕见。我能想起的，大概只有曾国藩和王闿运。

王闿运就学三年，日诵不及百言，有时虽能成诵，却不解其意，常引同学嗤笑。曾国藩的笨，更加出名。梁启超说过，曾国藩在同时代的名流当中，最是钝拙。曾国藩自言：“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流传一个笑话：小偷到曾家偷东西，正碰上曾国藩秉烛夜读，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多少遍，硬是背不下来，小偷本想等曾国藩睡着了再下手，等到半夜，见他还在背书，不肯睡觉，实在忍无可忍，跳出来骂道：“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也许连小偷都会背了。

需要注意，梁启超说曾国藩笨，与曾国藩说自己笨，皆是相对而言。所参照者，乃是彼时最杰出的人物，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如果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对比，曾国藩显然不笨。所以何贻焜《曾国藩评传》云：“曾公之个性，就智力方面言之，虽颇钝拙，究属中材。”中材之说，应是最公正的评价。假如曾国藩真是一个顶级笨蛋，不必说成就不世之业，单是那些诗文，便无法写出。

这里还是袭用曾国藩的说法，谈谈他的笨。从笑话来看，可知曾国藩对付愚钝的方法：勤奋。其实笨不可怕，可怕的是，笨而不觉其笨，抑或笨且懒惰。第一点错在笨人毫无自知之明（这愈发可以印证其笨），第二点错在笨人固然自知，却难自救。所幸这两点错误，曾国藩都避开了，他在复宋子久信中云：“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总结其意思，一是守拙，二是补拙。

守拙常与抱朴并用，针对弄巧卖智、不学巧伪而发。守拙之守，相当于“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之守，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有所不为。而且，守拙之拙，不是真拙，一个人，能自知其拙，自守其拙，正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毋宁说，守拙之要义，恰在于知其智而守其拙。

守拙限于有所不为，若欲有所为，还得补拙。曾国藩的补拙之道，要义有二：勤、慎。所谓“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具体来讲，“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欲去骄字，总以不轻笑人为第一义”。“不晏起”（不晚起）“不轻笑人”云云，听起来都是琐屑小节，平淡无奇，不过曾国藩一生行事，一反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之理，向来最重小节，由小而及大，知一字行一字，明一理守一理，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拿“不晏起”来说，能改正睡懒觉的毛病，还有什么改不了呢？

试举一例。李鸿章曾有“晏起”即睡懒觉的毛病，便由曾国藩所纠正。据李鸿章回忆：“我老师（指曾国藩）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朦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守拙，表现在读书方法，曰“读书不二”：“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与此相应的是“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这是笨法子，却适用于资质平庸之人。再说军事。曾国藩的兵法，有“呆仗”之名：“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譬如湘军攻城，不求速成，而讲持久，其主旨，即一围或困字，挖出双重壕沟，如铁桶一般围困城池——是以湘军大将、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有一绰号曰“曾铁桶”——待对方饿殍满地，弹尽粮绝，大抵便是湘军收功之日，打安庆、南京，莫不如是。这样的呆仗，虽为左宗棠等名将所不取，对付太平军却有奇效。

曾国藩守拙的功夫，倘若比作武术，我以为可对应“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独孤求败的玄铁重剑，重量不下七八十斤，剑尖剑锋都不开口，正合守拙之义，只要内功深湛，使将起来，威力无穷，胜过世间一切利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讲，即“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说罢曾国藩，再说胡适。说起来，曾国藩愚钝，胡适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绝顶聪明人之一。这二人，如何能联系起来呢？

我的联想，缘于胡适的治学方法，他借用宋人李若谷的做官秘诀，归纳为四个字：勤、谨、和、缓。“勤”指“眼勤手勤”，“谨”指不苟且，“和”指心平气和，“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查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或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缓”字最难，“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勤、谨、和、缓这四个字，环环相扣，如能和才能缓，能缓才能谨。

读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起曾国藩常常强调的“勤”和“慎”（有时还加上一个“诚”字），不仅道理相通，连措辞都十分接近。

胡适与曾国藩心心相印，不只是方法。钝拙的曾国藩讲究守拙，聪明的胡适则讲究藏晖。我们听过藏拙，那么与此相对的藏晖该怎么解释呢？

胡适曾以藏晖为室名，他的留学日记，最初便题作《藏晖室札记》出版；他与周作人通信，落款曾署名藏晖，周作人回信，亦称他藏晖兄。1955年11月26日，胡适复信胡光麃，解释藏晖的由来：“老兄是绝顶聪明人，总未免锋芒太露，未免得罪人。这是聪明人很难避免的灾祸。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但四十多年来，终不能实行此意。”

李白《沐浴子》诗云：“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意在劝人和光同尘，韬光养晦。胡适少时以藏晖自警，足见其自知之明与处世之道。他说自己大半生不能践履藏晖之意，则属事实，不过这谈不上什么遗憾，胡适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开一代之风气，引一国之潮流，毋庸藏晖，须当锋芒毕露，才能修成正果。

依我体悟，胡适藏晖的最大意义，不在隐藏聪明，与世浮沉，而在于不以自己为聪明。进一步讲，即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与正义、自己的主张为绝对之是，从而不容他人匡正。藏晖的根本用意，不是韬晦，而是慎独和反省，以此来破解“正义的火气”。曾国藩中年时曾经历从“自负本领甚大”“每见得人家不是”到“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的精神转型，对此，他归结于一个“悔”字，我则以为，以藏晖来解释，未尝不可。

引申起来，藏晖还有一重意思，即“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工夫”。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并举孔子、郑康成、朱熹、顾炎武等人为例。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是孔子做学问的功夫；“宋朝的朱夫子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转向“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

读到“宁拙毋巧”，不由再次想起守拙的曾国藩。就此而论，守拙与藏晖，笨人曾国藩与聪明人胡适，殊途而同归。

新 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雁阵经济模型”

梅新林

借鉴“雁阵经济模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上海为龙头，带动南京、杭州两翼的“雁阵模型”，继而延伸至引领全国、辐射亚太、面向世界三个层级的更大规模、更高层级的“雁阵模型”。

按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应重点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强化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的聚合发展，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

“一核”意指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按照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要求，加快提升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与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发挥浦东新区引领作用，推动非核心功能疏解，推进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升服务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能力。

“五圈”意指促进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具体来看，它包含两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省会城市都市圈。一是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镇江、扬州；二是杭州都市圈，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三是合肥都市圈，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

第二个层级是非省会重要城市都市圈。一是苏锡常都市圈，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二是宁波都市圈，包括宁波、舟山、台州。前者要求全面强化与上海的功能对接和互动，加快推进沪苏通、锡常泰跨江融合发展；后者要求高效整合三地海港资源和平台，打造全球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枢纽港、国际航运服务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形成长江经济带“龙眼”与“一带一路”倡议支点。

以上五大都市圈相当于五只“大雁”，其中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是分别伴飞于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的“次大雁”。以此类推，上海是“领头雁”，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是三只“大雁”，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是两只“次大雁”。同时，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又是各自“雁阵模型”的“领头雁”。

（作者是浙江省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来源：解放日报）

著名作家为啥鲜有“科班出身”

游宇明

在大学里教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个现象很使我疑惑：1949年以前的杰出的文学作家，出身于文学科班的极少，鲁迅与郭沫若是学医的，茅盾根本没读过大学，巴金最初学的是外语，后来虽然赴法国留学，他对哲学似乎更感兴趣，老舍上的是不分系科的北京师范学校，沈从文只有小学毕业，只有曹禺读了个西洋文学系，勉强可算文学科班生。

1976年以后走上文坛的作家，则以中文科班出身的居多：韩少功、贾平凹、路遥、梁晓声、格非、王跃文、阎真、刘震云、苏童、范小青、毕飞宇……莫言、王安忆等人虽然没有在最好年华时读大学，后来也接受过文学教育。自然，也有无科班经历却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比如王蒙、陈忠实、铁凝，只是杰出作家里具有科班经历的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可未必清楚，鲁迅作出这个选择前，已经拥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储备：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读书人，鲁迅少年时又师从学识渊博的寿镜吾读古书，自小抄录过《康熙字典》《唐诗叩弹录》以及陆羽的《茶经》和陆龟蒙集《五木经》《耒耜经》。1911年，抄录过两大册《说郭录要》和其他大量古籍。功夫下得这么深，鲁迅成年后想从事文学创作，还非得去读中文系吗？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人，少年时同样阅读过大量古籍，接受了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学教育。

如今的作家成长路径大不相同。我们中小学读的是语数外、政史地、物理化学等新式课程，与世界基本上是接轨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阅读古籍，接受潜意识的文学教育。何况，从功利角度讲，古代文学作品只占语文考试很少份额，似乎也“不值得”花费太多时间。如此，梦想成为作家，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相对省事。

有人说：“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这提醒相关专业重视文学写作、突破种种清规戒律，多触摸真实大地，当然是可以的，但假若将它当成一种文学的既成事实，只能说明对文坛的隔膜和对当代文学教育的无知。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教授 来源：深圳特区报）

规而不范、规而难范，原因何在

世象管见

吴启钱

规范即定规矩，划界线，清边界，明文规定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以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用规范来整治工作中的乱象，比运动式整顿、集中式清理，更加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达到更好的效果。因此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几乎是隔三岔五就会发一个规范，很有“经常抓，抓经常”的势头。

然而，同样的事情，三番五次规范，说明虽三令五申却没有效果或效果很差。规而不范，规而难范，原因何在？

一个原因是“规而不愿”。心不甘情不愿，但无奈上级有要求，基层有怨言，群众有呼声，只得应付一下，发一个文件表示抓过了，这本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社区、学校、企业这些基层，是开展工作创新的最好场所，也是改进工作作风的好地方，但也容易变成名利场、唐僧肉，谁都想进来，想吃一口。对于主管部门也好，其他单位也罢，一项工作如果能进到基层，不但能把工作推下去、推出去，减轻自身压力与负担，还能收到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名声，年终“总结”起来还有内容，简直是无本生意或小本买卖，名利双收。加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无论是企业、学校还是社区，都不具备与上级单位“讨价还价”的资格与能力，对各种“进”不可能说一个“不”字，也就只能老是“被进”了。内心可能真的不愿意，规而不愿，于是只能应付，而应付就会反复，容易搞成一阵风。

一个原因是“规而不实”。笔者看了一些规范，洋洋洒洒数个或数十个条文，有针对性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却不多，多数是为规而规，以意义作动员，以原则作号召，以上级的要求为要求，从文本上看是一种规范，实际上是传声筒、复印机和复读机，没有脱离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窠臼。一些“规范”作为形式主义的产物，无论是政策还是指令，没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不能在吃透上情、了解下情的基础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条文，对实际工作难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容易变味、架空和异化，受到“软抵制”，就容易“翻烧饼”。

还有一个原因是“规而不刚”。规范的生命力在实施，越是解决基层难题、解决实际矛盾、解决群众诉求的规范，越要具体明确，有刚性有力度，有说一不二的态度，有下不为例的权威。这就要求规范一要有政策依据，二要符合法定制定程序，三其内容不能违反政策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些规而不刚的规范，恰恰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规范制定主体的职权不足以制约其他单位，规范的条文表述没有用法律或政策语言，不严谨、不严肃、不严格、不严厉，都影响了规范的刚性。

规而不愿、规而不实、规而不刚，所以规范学生，学生负担日重；规范社区，社区牌子一个没少；规范企业，企业怨声载道；规范基层，基层越发不轻松。阳光底下无新事，无论是“三进”还是“五进”，在各种规范之前，法律原则和政策界限一直都在，无论是社区还是企业或是学校，都是依法自治的组织或单位，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政策就是“人随事走、费随事转”，上级单位要求基层做这样做那样工作，都可以，但你人要下来，钱要下来，不能向基层一进、一推了之。如果真的这样施行了，一次次出规范、一次次被规范的现象就会少很多。

漫画角

帮 忙

丁 安 绘